

# 无地彷徨

“五四”及其回声

汪晖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 无地彷徨

“五四”及其回声

汪晖 著

文	學
叢	者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李庆西

封面设计 李庆西

无地彷徨

汪晖著

---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插页2 字数320000 印数0001—1000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339-0586-5/1·547 定价：12.00元

## 自序

他匆匆忙忙地追求真实，就像初踏上溜冰鞋的新手，而且，他正在练习的地方，还是一个禁止溜冰的场所。

——卡夫卡

### 一

在这个尚有寒意的春夜里，我有些惊异于自己的踌躇：书稿已于两个多月前寄给了出版社，而现在我却不知道是否应当重版其中的那些发表于八十年代的文章。这部书稿中的有些文章的观点、术语以至行文方式，在今天，不仅需要作更精确的表述，而且需要做细致的反省。实际上，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发生着一连串含义深远的事件，它们在促成世界历史的巨变的同时，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历史和生活的许多基本看法。从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开始，我和朋友们集中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检讨八十年代的学术现象，而问题一经提出，人们的理智活动就越过了这种直接的自我批判，并把八十年代的学术现象同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历史观念和学术范式联系起来。这表明：近一二年来，在朋友们的研究之中渐趋深入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清理工作，

从一开始就具有自我批判的性质。

仿佛是暴风雨之后的原野，许多事情变得更加鲜明了。在经过长久的不安和踌躇之后，我终于落笔写下这篇序并促成此书的出版，或许部分的原因是我怀着这样的信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二十世纪最后一代学人目前从事的工作完成了对这本书中的某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的批判。甚至可以说，这些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已经显示了历史的趋势。也许有的朋友未必明确地抱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一种告别仪式，一旦新的学术范式和历史观念形成，我们就可以欣慰地说我们已属于未来。然而，告别仪式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象征性的，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方法——无论它听起来如何完美——可以作为新规范的标志。告别的乐曲已无数次庄严地奏起，但每一次都会让人听到某种相似的旋律，那感觉总使我想起一九九〇年一个秋日，我独立于秦岭的荒山之巅，一面久久地凝视着暮霭与黑色的群山之间挣扎的如血的残阳，一面勾画着朝日喷薄而出的壮丽图景：慷慨而悲凉。

如果不对自己负有直接责任的过去有深刻的洞察，那么对历史变迁的理解也不可能达到铭心刻骨的深度。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之中，越过对刚刚发生的一切的细致考辨与批判，用一种新的历史态度而不是深入的理性工作来谴责那个过程，有可能导致新的偏见。指责八十年代的某些学人追名逐利、学风浮躁，并把这些现象归结为文化“失范”所致，这不无理由又失之肤浅，因为我们无法怀疑这一时代的学人提出如此众多的批判性见解的态度上的严肃性和历史合理性；个别人的失误可以用道德的判断给以解释，一个时代的趋势

绝不能简单地加以道德的谴责。实际上，过去十年的学术与思想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并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学术发展提供了基础。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对于这个辉煌时代的自我批判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展开的，批判的根本指向与其说是这一时代的具体成果，毋宁说是这一时代的学人普遍持有的那种激进主义的、反传统的历史信念，特别是建立在这一信念基础上的理论框架。正是在这种反传统信仰的持续蔓延过程之中，年轻一代学人在知识结构上变成了“非传统的”或“无传统的”一代，并且从未认真地把这当作自己的严重局限。

这部书或许正可以提供一份记录：时代的冲动，理智的困扰，知识的局限。沿着时间的线索重新阅读这些文章，我还是找到了我的思想变迁的脉络。借着重新出版这些文章，清理和总结我自己的学术道路，对我而言，至少是几年来的宿愿。作为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人，这点自我检视也是反省刚刚过去的“新时期”文化的内容之一吧。

## 二

还是先从鲁迅说起。

不仅我最初的研究工作是从鲁迅研究开始的，而且我对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基本看法也深深受到鲁迅的影响。然而只是在完成了我的第一部专著《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之后，我才感到我对鲁迅的理解刚刚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但此时我的兴趣已转向了思想史领域。一九八八年，在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之后，

应《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信先生之约撰写了《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试图对几十年来的鲁迅研究传统进行理论清算。在文章的末尾，我曾说：“对我们来说，对历史的批判就是对自我的批判，因为我们不仅属于现在和未来，而且属于过去——那个漫长的、甚至未曾身历的过去！”在此，我很愿意重申这一点。

虽然很早就知道鲁迅的名字，他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 中国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声望的人。但真正系统研读鲁迅著作是在大学时期。那是一个理性觉醒的时代，伴随着对“文革”的越来越彻底的否定和大量历史真象的展现，我们置身于一个把怀疑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时代。几乎是疯狂的阅读使我一次又一次地震惊：呵，真实的历史竟是这样！没有什么比“幻灭”这个字眼更确切地表达我们对曾经拥有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以及一整套观念体系的态度，也没有什么比“寻求真实”这个短句更深刻地说明我们内心的惶惑与渴望。在鲁迅的偶像遭到同辈人的普遍怀疑和冷淡的同时，我想看到的是那些“纸糊的假冠”背后的“真实”——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当“寻求真实”的努力最终转化成对“真实”这一概念的自我质疑时，我才发现“真实”本身不断地被人们——包括我自己所构造，于是，对自己用以构造“真实”的那些前提的反省逻辑地出现了。而这时，我对鲁迅的思考已耗去了近十年的时间。

收录在本书第二辑中的关于“鲁迅与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两篇论文，原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上、下篇，总题是：《一个角度的观察：鲁迅前期思想及其与创作的关系》。但这并不是我的最早的鲁迅研究论文。读大学三年级时，我撰

写了《论鲁迅小说〈孤独者〉》，此后又写了关于《野草·影的告别》等文章。我选择的篇什都是在传统的鲁迅研究中不受重视或被视为消极、灰色、阴暗的作品。然而，恰恰是在这些作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对传统的深刻的不信任感，一种对“黄金世界”和一切虚幻事物的怀疑和拒绝，一种对自己也身陷其中的生活方式的严峻的否定态度，一种置身“庸众”荒原的先觉者的孤独、愤激、由爱而憎、终至趋于复仇的心态，一种在受骗的、幻灭的虚无主义气氛中执著于“现在”的挣扎感。很难用言词来描述那种阅读过程所体会到的心灵共震。我的这些早期习作并没有任何的理论创造，具有意义的可能仅仅是对象的选择。不是写作对象的内容和时代，而是我进行写作的时代和内容才是重要的：我对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内心苦闷表达了道义上的肯定和同情的理解，而这是经历了“文革”时期的“群众”暴政和漫长的自虐、受虐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

然而，“寻求真实”的激情在文章中却总是被纳入到我们欲加拒绝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之中。过往的生活教给我们的不单是一组简单的信条，而且培养了我们感知生活、表达自己的唯一方式。记得有位老师给我写信说，我的信写得比论文好。那是因为信表达了我的直接感受，而文章却以习用的方式整理了我的感受。我的硕士论文的情况正是这样。这篇文章迄今为止仍是鲁迅研究中唯一一篇系统讨论鲁迅与个人无政府主义的论文。我所关注的，是鲁迅思想中的“个人”概念的复杂含义，并寻找鲁迅文学中的那些反叛的、怀疑的、孤独的、复仇的精神特征的理论根源。回头阅读这篇早期习作，我的感受颇为复杂。一方面，这篇论文隐含了许多



重要的观点和资料，例如，对鲁迅思想中的“个人”概念的分析，对鲁迅与施蒂纳、尼采、阿尔志跋绥夫等人的不同关系的阐释，对鲁迅小说的情感线索的揭示，以及关于“中间物”概念的最初说明，……这些都是我日后研究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当我提出这些问题之后，我在未作进一步深入的理解的情况下，即进入对于鲁迅与个人无政府主义关系的辩解。文章不但未加论证就袭用了诸如“封建”、“民主主义”、“个性主义”等概念，而且在若干部分，我的分析完全是辩解性质的，即先把施蒂纳、阿尔志跋绥夫及其个人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创作界定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极端个人主义，而后论证鲁迅的吸收如何避免了这种理论与创作的反动性。这里既缺少对施蒂纳、阿尔志跋绥夫的深入的“同情之了解”，又隐含了对当时流行的先验的世界模式的无条件的肯定。正如我在分析那一时期关于鲁迅与尼采等“反动”作家的关系的研究时指出的：在这类研究中，“立论的方式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为什么会接受诸如尼采这样的‘反动’思想家的思维成果？因此，尽管人们承认存在这样那样的承继关系，但论述的终点始终是辩解性的，即把所谓‘本质的区别’作为研究的最高结果。”这样，文章的逻辑就沿着“历史性的误解”——→“特定条件下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本质性的区别”这一线索向前伸展。对于“个人”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精神现象的分析没有充分地展开，并构成对文章的先验前提的验证，相反，却变成了对这一先验设定的颇为勉强的证明。例如，基于鲁迅的复杂的“个人观”所产生的反国家、反民主以及对民众和团体的怀疑态度，我们是否还可以按通常的理解称他为一个“民主主

义者”呢——至少是早期？更进一步说，以此为基础产生的独特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历史境遇中蕴育着怎样的结果呢？文章没有、甚至未曾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并给予认真的解答。

一九八五年初春，我离开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家乡北上京城，师从唐弢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一九八五年在“新时期”的文化进程中是一个特殊的年头：从方法论的运用到文学观念的变迁，从现代派小说登场到“寻根文学”的兴起，从“走向世界文学”的呼吁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从内容的现代性到文体的现代性实验……人们日益意识到中国社会的进步深刻地受制于自身的文化的和制度的传统，并以现实的感受体验着现代价值观与自己承担的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冲突。同行们又一次发现了传统的无处不在，但由此引起的却是更激烈的对传统的仇视。这年的春天，王富仁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提纲，指出鲁迅小说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从而把理解鲁迅的重心从政治领域移向思想文化领域。此后不久，我撰写了《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一文，试图在鲁迅小说世界的复杂的精神特征与鲁迅内心世界之间找到关联的纽带。从方法上说，我的意图在于把理解鲁迅小说的重心从客体方面移到主体方面，从而展现作品的心理内容。但这篇文章的主要贡献却是提出了“中间物”意识这一概念，并用以解释鲁迅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自那以后，“历史中间物”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鲁迅研究界不断引起讨论，并成为第二届“亚洲国家现代化与民族性因素”国际学术讨论会（东京，1991）的中心议题之一。

在我看来，“中间物”这一概念标示的不仅是鲁迅个人

所处的历史位置，而且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这一概念的前提是对进化或进步的信念以及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自我意识，它标志着对于自身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洞察，从而使得鲁迅在观察社会事务时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定位和感觉方式。有人认为这一概念在鲁迅那里只涉及了白话文问题，那是一种可叹的短见。的确，“历史中间物”在鲁迅那里仅仅是一种朴素的比喻和自况，其直接指涉的是语言问题，但其含义却是丰富和深刻的。鲁迅正是在自己与传统的语言的对抗中发现了自己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与传统的联系，获得了“中间物”的自我意识，这是因为语言乃是传统的基本载体。作为中国传统的批判者，鲁迅的反传统主义的最激烈的标志即是对传统语言形式的批判，从文体到方块汉字都在否定之列；但同时，鲁迅发现这种自觉的否定过程也必须借助于中国特有的语言形式。其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在“反传统”的过程中确认了自己与传统的联系，因此，“反传统”的最终表达形式就是对自我的否定；这是一种“原罪”式的自我意识，它把在社会生活中的“反传统”行为同时作为一种“自我救赎”的内在冲动。收录在本书中关于《野草》和鲁迅小说的两篇论文就是分析鲁迅的人生哲学的内在逻辑及其在叙事过程中的展现。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到彻底的反叛在文化上是不可能的，因而鲁迅在实际操作中探索了一条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道路，如他对中国小说的研究之类。他个人偏爱中国文化内部的非正统和反正统的文化（如小说、笔记、野史、杂说、嵇康、阮籍等等），也可以说是在自身的文化困境中的颇具悖论意味的选择。

但是，“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与操作上的继承传统并未消解鲁迅的内心矛盾，倒是强化了那种自我分裂的感觉：鲁迅通过确认自己与传统的联系来表达自己不属于未来的悲剧性的人生观，而“不属于未来”的判断又把对自己的无望的宣判转化成对于生活进程的信心，并用后者反抗身内的绝望。在鲁迅那里，“未来”的意义最终只能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展现出来，除此并无别的表达方式。“历史中间物”意识最初是在“进化”的意义上提出的，但在鲁迅精神过程中又衍生出两种与“进化”的理念相悖的思路：就个体而言，它把个体生命理解为逐渐消亡或走向死亡的一次性存在，并暗示出个体生命的奋斗与挣扎的深刻的无效性；就世界而言，它把历史的进程理解为无意义的循环或轮回，并暗示改革的最终敌人并非具体对象，而是隐藏在变迁的历史之中的不变性或有形敌人之中的“无物之阵”。与“无”抗战的人只能是永远的失败者，而只有永远的失败者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于是，一方面，“历史中间物”意识含蕴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和悲剧意识，另一方面，恰恰是对“绝望”的洞悉，使鲁迅获得了“反抗绝望”的勇气和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的几个中心概念是：明与暗、生与死、爱者与不爱者、友与仇、人与兽、无地、无物之阵、走向死亡的生命、坟、绝望、罪感与赎罪、战士、过客、影子、走……

我曾借用汤因比的话说：鲁迅“不仅‘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这是对这位反叛性思想家的尴尬处境的扼要描述。透过“历史中间物”这一概念的复杂含义，我逐步地形成了关于鲁迅的悖论式的精神结构的理解。我的基本看法是：鲁迅的思想和文

学世界是由许多自相矛盾的观点、情感、思维形式构成的；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在不同时期虽有消长，但同时共存和发展，构成了一种悖论式的张力结构；鲁迅的内在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情感与理智、历史与价值之间，而且存在于情感和理智领域的内部。因此，那种试图把鲁迅思想纳入到一种有序的辩证统一过程的做法，或者，那种用东西方文化冲突或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来解释鲁迅的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简化了鲁迅思想和文学世界的复杂性。

上述看法当然有着直接的针对性。鲁迅研究中一向把“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视为定论。但这一描述性结论的可靠性却让人生疑。我在此只能先分析这两个判断句的前半段，但仅此亦足以见出它们的失误。鲁迅在一九二七年的确说过他的进化论的思路“从此轰毁”的话，我以为这是在特定情境下的某种象征性说法。鲁迅的早期和前期的思路中不仅存在“进化论”的思路，而且存在着反进化论的或循环论的思路，这两种思路互相矛盾，却同时并存。鲁迅早年曾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解为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用以批判中国的传统；但在涉及国与国的关系时，他又引入“人道原则”对之进行限制与否定，显然在这一方面消解了“进化论”的“普遍”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用一种观点取代了另一种观点，而是对两种对立的观点表现出同等程度的信任与热情。他一面说人类历史是曲折向前的进化过程，另一方面又说这个过程不过是一种“偏至”的过程，“进化”的每一阶段都构成了对人的日益严重的压抑；他一面说青年胜于老年，表达了乐观的历史信念，另一面又把中国历史描绘成永无止境的两种奴隶

时代的循环相续……如果没有关于“进化”的观念当然无以产生“中间物”的说法，但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对于历史的悲观主义理解也不可能出现那种“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用“民主主义”概括鲁迅前期思想至少是不准确或不全面的。早年的鲁迅曾期待共和制度早日来临，此后他对辛亥革命也持欢迎的态度。但是，鲁迅对民主制度以及自由平等原则却怀有深刻的疑虑。鲁迅在一九〇七年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反对“众治”、“大群”的观点人所共知，他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构成了远较独裁制度更为严重的对人的专制；这种观点虽然直接针对洋务派、改良派和革命党人的“制造”、“立宪”、“国会”的主张，但具有重要性的是鲁迅的理论出发点：他选择了施蒂纳、尼采、基尔凯郭尔等人在不同场合阐述的不尽相同的“个人”概念，并由此出发展开了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西方民主化和工业化过程的猛烈批判。从基本的方面看，鲁迅倾向于那些十八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的德国批判者的观点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前者。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欢迎以及他对传统制度和文化的抨击是真实的存在，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他对民主制度及其理论原则的置疑。这种理论上的观点同他一生中团体生活的那种不信任感是颇为一致的。

我们习惯于把鲁迅称为“启蒙主义者”，其主要理由当然是他毕生坚守的“立人”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以及他对科学文明的信任。但是，鲁迅思想中的独特的“个人”概念却使得他的思想同时具有后启蒙的或非启蒙的特点。在十八世纪之后，“启蒙主义”这一概念的内在规定性当然是

和那一时代的启蒙学者的思想活动联系在一起，其核心是“理性”这一概念，而“理性”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种把世界区分为“主体——客体”的认识论倾向。鲁迅的“个人”概念主要来自施蒂纳、尼采、基尔凯郭尔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各不相同，但都对启蒙主义时代以来的物质发展、政治制度和理性原则展开了激烈的抨击，对“个体人”的关注形成了一种在自我与自我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非理性主义体系。鲁迅的“个人”概念与他的以“反思”、“内省”或“自我批判”为特征的“立人”思想具有内在关联。这种把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材料适用于理性目标的方式，同样揭示了鲁迅思想的悖论式的特征。

鲁迅的思想不仅在上述的意义上呈现出悖论式的结构，而且这种状态也体现在他的价值追求和情感领域之间。这就是如列文森所说的理智与情感、价值与历史的冲突。例如鲁迅的道德观、婚姻观与他自觉承担的“孝子”角色和处理婚姻的方式之间的某种“矛盾”。不过，这种分析模式还是大大减化了问题的复杂性，因为鲁迅的内在矛盾不仅存在于这两个领域之间，而且存在于各自领域的内部。对传统的反叛与对传统的依恋看来并不仅仅分属于理智领域和情感领域，而是在这两个领域内部都同时并存。或许根本的原因在于这种划分本身不过是一种假定，而人自身却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对鲁迅精神结构的分析并没有消解鲁迅思想存在一个内在的发展过程，我所反对的是那种认为一旦鲁迅接受了某种新的思想就解决了他的内在矛盾或悖论的观点或思考方式。更为重要的是，鲁迅晚年的思想同样存在着复杂的含义。他

的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观点，并参与了左翼文艺运动。但仅仅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未能完成对鲁迅晚年思想的详细考察。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鲁迅晚年一些文章之间的微妙差别。从这些差别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那时的良苦用心。例如，在一系列悼念文章中他在声讨当局的同时，一再为“无产阶级文学”而自豪，但在例如《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文章中却怀疑是否存在真正的“无产文学”，因为“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这些非常隐秘的现象隐含着重要的内容，也是透视晚年鲁迅思想和心境的契机。

关于鲁迅的悖论式的精神结构，鲁迅文学世界的精神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叙事形式的研究，构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的基本内容。由于我对鲁迅的看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而《反抗绝望》一书的写作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显得不平衡。毕业在即，我已无时间将书稿重新写一遍。若干的陈旧术语和一般性的判断散布在此书的各个部分，有些章节如第四章也写得勉强和生硬。我也未能完成预定的第四编，深入地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看来不仅是由于知识上的准备不足，而且还因为我基本上是在站在鲁迅的反传统主义立场考虑问题，无法对传统的复杂性及其与鲁迅的复杂关系作出细致的分析。我注重于鲁迅的独特性的研究，而对这种独特性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中的意义、后人对它的承继方式、与其他思想家的关系等等，也没有展开论证。这既有技术上的困难，亦有认识上的限制。不



过，或者是澈帚自珍吧，这本书凝聚了我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以至生命的体验，我自以为其中包含着若干迄今为止仍然非常重要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不仅已经启发了一些和我志趣相近的年轻研究者，而且还会成为更年轻一代思考鲁迅的一个起点；至少它们构成了一种在学术意义上的批判对象。

鲁迅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魅力在于他总是能激起人的激情，你可以对他持或憎或爱的态度，却不能平静地对待他——至少对于那些认真地阅读他的著作的人来说是如此。回想起我自己研究鲁迅过程中的“精神失常”，我知道我的生命曾有过怎样的激越的跳荡。有时我会想起鲁迅的散文诗《死火》里的意象，那跳荡的火焰和烟尘凝结成无情的冰块，我不敢期望有人用体温使他复活，那不单将烧毁我自己，而且使爱我者并这一点僵死的却又是生动的过去的生命也无从记起。我惊异于自己的有所顾惜，我不知道未来的一天，我能否义无反顾地走进那火湖。

### 三

我于一九九〇年的五月奉命到陕西省山阳县生活了半年。山中的生活使我得到了十年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和闲暇。那种生活同刚刚过去的喧闹的两年形成了奇异的对比。用乡村的眼光重新打量恍若隔世的北京，这在我是一件意义很深的事情：我熟悉的世界成了一座远远被观赏的舞台，剧中人因为过于专注于身边的事而早已遗忘了我此刻置身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沉默地存在着，仿佛是对舞台及其意义的嘲弄和